

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视阈下 “周边安全学”的构建

李敦球 金灿荣

【内容提要】“周边安全学”是一个以中国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概念，是从中国国家安全视角出发，观察、研究和处理与中国相邻区域和国家安全事务的学问，具有区域性、经验性、综合性、战略性、政策性等特征。周边始终是中国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的亚洲安全模式，为周边安全指明了实践路径。亚洲安全模式与周边安全问题是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共同研究的对象。“一带一路”倡议始于周边，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为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交叉融合下的“周边安全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场域和理论检验平台。学科体系建设是“周边安全学”长远发展的制度保障，“周边安全学”将为理解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挑战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工具。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亚洲安全模式；“周边安全学”

当前，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周边安全研究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议题，也是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交叉学科领域的前沿议题。2025年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相较于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工作”扩展为“周边工作”，充分显示出周边事务从外交领域向更广泛周边事务拓展，成为统筹内外，兼顾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全方位工作。将“座谈会”改为“工作会议”，体现了党中央对周边工作的全面重视。^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提出构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②这将周边工作的重要性和周边的地缘战略价值都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周边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基本定位，为推动构建“周边安全学”指明了战略方向与实践路径。本文将从学科理论基础出发，系统分析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学科交叉的内在逻辑关系，探讨亚洲安全模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阐释“周边安全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构建逻辑与理论框架，考察“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安全的互动关系。通过整合多学科视角，为理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提供系统

的学术分析和战略思考。

一、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交叉与关联

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两大一级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上呈现出既深度交融又各具特色的互动关系。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学科代码1407），与国家安全学（学科代码1402）共同构成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兴学科体系。两大学科虽各有侧重，但在亚洲区域研究与周边安全研究领域形成了紧密的学术对话与实践协同。

学科定位与功能互补方面，区域国别学主要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是多学科、跨学科、学科融合的综合领域。其核心使命是通过“知外”，即对特定区域和国家进行多维度分析，为国家战略制定者提供全面、深入的认知基础。相比之下，国家安全学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更加聚焦于本土国家安全理论建构、国家安全教育以及服务国家安全实践，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两大学科形成了“区域认知”与“安全实践”的功能互补关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创新提出了“涉外国家安全”话语。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第十三条“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中第53款的标题是“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具体内容为：“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健

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健全维护海洋权益机制。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③可见，“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是处在“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的首要位置，是重中之重，生动并有力地说明了涉外国家安全特别是周边安全工作正是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共同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理论方法交叉层面，区域国别学强调运用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对区域问题和国别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既发挥所长，又高度综合，形成独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而国家安全学则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我国的安全话语和观念，并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两大学科在特定地区（或国家）研究中展现出明显的理论协同——区域国别学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重要的域外知识基础，或者一些复杂问题的历史经纬；而国家安全学则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问题导向和安全视角。

从实践应用协同角度看，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形成了“学用相生”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国家战略为区域国别学明确了研究重点，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战略上指明了我国的世界视野，但在操作中需要一国一策，这就为区域国别学明确了研究的重点区域、国别和方向。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为国家战略提供了多维度支撑：在知识产品方面，对特定地区潜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类风险和机遇进行研判；在外交政策方面，为制定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提供策略建议；在经贸合作方面，解析各国经济结构、产业发展、市场规则；在国家安全方面，提升识别地缘政治风险、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学科发展动力机制上，两大学科呈现出

“国家战略引导”与“学科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特征。国家战略的实施往往伴随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为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2020年前后，国家留学基金委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以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为目的，选派、资助区域国别人才赴对象国学习交流。与此同时，学科内部的规范化建设也在持续推进，2024年1月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和2025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涵及学科范围进一步作出明确划分和界定（见表1）。

表1 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主要区别、交叉与关联

比较维度	区域国别学	国家安全学	两学科的交叉与关联
学科定位	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综合性研究	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研究	区域认知与安全实践的互补
核心方法	多学科交叉融合	安全理论与政策分析	方法论上的相互借鉴
服务面向	国家战略的域外知识支撑	国家安全决策支持	共同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研究重点	区域与国别的全方位研究	安全威胁与应对策略	在周边安全等领域交叉
人才培养	“国别通”“区域通”复合人才	安全理论与实务人才	在安全研究领域协同培养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地区地缘安全环境错综复杂，国家安全与周边安全相互交织、唇亡齿寒、密不可分。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认为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主张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从而实现普遍安全、共同安全；主张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

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拓展，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交叉互动将更加紧密。特别是在亚洲区域研究与周边安全研究领域，两大学科的交叉融合正在催生新的知识增长点和实践创新点，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研究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二、“周边安全学”及其与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的关系

在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交叉地带，“周边安全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构想正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工作的重要目标，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相对于中国与周边经济合作而言，周边安全合作起步较晚，所以更需着力加强研究，从而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协调。构建比较系统的“周边安全学”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整合分散的研究资源，更能为中国的周边工作与地区安全战略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周边安全学”是一个以中国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概念，是从中国国家安全视角出发，观察、研究和处理与中国相邻区域或国家安全事务相关问题的学问。“周边安全学”具有区域性、跨国性、经验性、综合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等特征，其本质属性是国情和区情问题研究，学科属性属于区域国别学的范畴，同时还与国家安全学和国际政治等学科有密切关系。

核心概念与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周边安全学”理论化的起点。“周边安全学”可以概括为：以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家为特定研究对象，

对与中国紧密相关联的地区安全问题、国别问题、边疆问题等内容进行系统性整合，致力于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以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国家崛起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一界定明确了“周边安全学”的空间范围——中国周边地区与国家，以及战略价值——服务于中国安全与发展利益。一个国家的安全结构关系往往会造成一种“本土安全—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三重结构。其中，经由本国边疆与周边邻国形成的特殊安全关系，又会反过来对本国的国土安全与国内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周边安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和制约一国安全稳定和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要因素。

在学科定位与边界方面，“周边安全学”面临着如何平衡交叉性与独立性的挑战。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均属于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周边安全学”作为两者的交叉领域，既需要保持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又需要确立独特的学科身份。可以看出，“周边安全学”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学、国际安全、外交学和中国外交等相关学科与方向的界限、区别与联系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区域国别学的范畴内，需要不断研究、充实和细化“周边安全学”的内涵与外延。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学科一般需要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需要建立一个核心问题以及与此联系的核心概念；二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三是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四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构建是“周边安全学”学科化的核心任务。“周边安全学”的学理价值取向应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阐释周边安全演变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对周边安全的一般性认识，推动关于周边安全知识和认知的发展；二是在此基础

上应用已经形成的“周边安全学”知识体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提供决策参考。在理论来源上，“周边安全学”需要整合传统安全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理论，同时吸收亚洲本土的安全思想。特别是中国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周边安全学”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指引。在分析方法上，“周边安全学”应当采用多层次分析框架，将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体层次的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视野。

研究方法论层面，“周边安全学”需要发展跨学科、多方法的综合研究路径。交叉学科是基于多个传统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研究领域和新知识体系。“周边安全学”需要多学科、跨学科的参与，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大视野的研究。具体而言，“周边安全学”与政治学、军事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很多学科都有密切联系，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都有助于“周边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周边安全学”作为一门高度经验性和情境化的学科，其最核心的生命力在于田野调查和基础性研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周边安全学”应当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既重视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也运用大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等新兴研究方法。

学科体系建设是“周边安全学”长远发展的制度保障。当前，应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不断拓展研究内涵，形成相对完整的二级学科体系。在高等教育领域，可以在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设置“周边安全学”二级学科，培养专业化研究人才。“周边安全学”的理论构建不仅具有学术和学科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与实践价值。随着中国国家利

益的不断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通过系统化的学科建设，“周边安全学”将为理解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挑战提供更加科学、全面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工具。

三、亚洲安全模式与“周边安全学”共生演进

亚洲作为世界上文明多样性最为丰富、地缘政治格局最为复杂的大陆，其安全模式的演变历程既反映了区域内部权力结构的变迁，也体现了外部力量与本土秩序的互动博弈。从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双重视角审视亚洲安全模式，不仅能够把握其历史脉络与当代特征，更能为构建新型区域安全架构提供理论支撑。

传统亚洲安全秩序的演变呈现出鲜明的文明特性和区域逻辑。在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区域秩序长达数个世纪，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礼治”安全规范。这种秩序强调等级性、互惠性和文化认同，与欧洲近代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东南亚地区的“曼陀罗”(Mandala)体系则体现了另一种安全逻辑，其特点是权力中心的流动性和边界的模糊性。南亚次大陆的“查克拉瓦尔蒂”(Chakravarti)观念则反映了一种基于宗教文化认同的安全理念。这些传统安全模式虽然在殖民主义冲击下逐渐式微，但其文化基因仍深刻影响着当代亚洲国家的安全观念和行为方式。

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后，亚洲安全模式经历了复杂的转型过程。冷战时期，亚洲成为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形成了以双边军事同盟为主轴的安全架构，如美日、美韩同盟等。与

此同时，不结盟运动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反映了对自主安全道路的追求。冷战结束后，亚洲地区安全合作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既有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也有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安全合作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安全模式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差异性，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次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安全机制。

当代亚洲安全格局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多层次、碎片化的复合型安全架构。在区域层面，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多边机制共同构成了区域安全对话的重要平台。在次区域层面，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安全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则因印巴矛盾长期陷入停滞。这种安全架构的多元性反映了亚洲地区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也使得任何单一的安全模式都难以适用于整个亚洲地区。

亚洲作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地区之一，其安全模式呈现出与西方传统安全架构截然不同的特征。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亚洲安全模式即“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不仅反映了地区安全实践的经验总结，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一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和现实需求，体现了亚洲国家在安全领域的独特智慧和创新探索。

亚洲安全模式三大要素中的第一大要素即安危与共作为亚洲安全模式的核心原则，强调国家间安全相互依存的本质特征。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敌人或者朋友，但是无法选择自己的邻居，这就是地缘政治对于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这一理念挑战了西方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

安全观，主张通过建立共同安全而非排他性安全安排来维护地区稳定。在实践层面，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推动建立不针对第三方的安全合作模式。与北约等军事同盟组织不同，这种合作模式不强求成员国在安全政策和立场上完全一致，而是尊重各国家安全关切的差异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安危与共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中的零和博弈思维，从客观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在安全上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⑤

求同存异原则反映了亚洲地区文化多样性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亚洲各国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完全统一的安全架构难以建立。亚洲安全模式不寻求强行消除这些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找合作空间。“对于周边地区安全合作的推进，需要基于系统集成的视角，注重各领域安全的协调推进，基于‘求同存异’提升安全合作整体水平，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某个领域安全的‘木桶效应’”。^⑥这一原则在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峰会（EAS）等地区机制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些机制允许成员国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上开展灵活多样的安全对话与合作。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时，也秉持这一原则，一方面坚定维护核心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分歧，为地区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话协商作为亚洲安全模式的重要方法，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分歧。中国一直强调国家之间以和为贵，处理彼此间分歧要坚持对话而非对抗。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分歧时，中国主要采取和平方式，同不少国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了领土边界等

重大问题。这一传统在冷战结束后得到进一步发扬，显著体现了对话协商精神。与西方动辄使用制裁、武力威胁等手段不同，亚洲国家更倾向于通过长期对话建立信任，逐步解决复杂的安全问题。

亚洲安全模式的实践成效已经得到历史验证。回顾冷战结束初期，有西方学者曾预言“欧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认为亚洲会重蹈欧洲战乱不息的覆辙。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并未爆发大规模热战，而欧洲地区却经历了科索沃危机和乌克兰危机。西方学者的预言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简单将西方国际安全理论移植到亚洲地区，忽视了亚洲地区的特殊性。亚洲安全模式的成功实践表明，基于地区特性和文化传统的安全安排比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更为有效。

亚洲安全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特别是美国强化亚太盟伴体系带来的冲击。当前，美国强化亚太盟伴体系，试图制造和扩大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嫌隙，将周边经济合作政治化、安全化，破坏中国周边共同安全。美日韩“准亚洲版北约”的形成就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首脑在戴维营会谈中宣布了一系列强化三边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安排，包括设立部长级年度会晤机制、举行年度多领域联合军事演习、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等。这些举措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色彩，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与此同时，北约加快向亚太扩张的步伐，与日本、韩国等签订“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试图将欧洲的对抗性安全模式移植到亚洲。

面对这些挑战，亚洲安全模式展现出强大韧性。多数亚洲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寻求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自主。东

盟中心地位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继续得到维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经济合作机制为安全对话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与亚洲安全模式一脉相承，为应对地区安全挑战提供了理念指引。随着亚洲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亚洲安全模式有望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为地区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周边安全学”的核心原则集中体现为“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这一原则直面“亚洲安全悖论”，即经济相互依存加深与安全信任赤字并存的矛盾。亚洲安全模式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标志着“周边安全学”理论的重大创新。这一模式将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开创了区域安全治理新境界。亚洲安全模式的未来发展将深刻影响全球安全格局的演变。在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的交叉视野下，亚洲安全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具体的安全议题，更需要理解塑造安全观念和行为的深层文化逻辑。只有建立在区域特性基础上的安全理论，才能为亚洲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亚洲安全模式与“周边安全学”在学理与逻辑上存在紧密的共生关系。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催生了独特的区域安全实践，亚洲安全模式为“周边安全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样本，而“周边安全学”则通过概念化和理论化，赋予区域性实践以普适性学理价值，为解读这些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二者相互印证，共同构建了对亚洲安全秩序的理解体系。因此，“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符合亚洲各国的共同利益，也为进一步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指明了现实路径。

四、“一带一路”实践与“周边安全学”的研究应用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为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研究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场域和理论检验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实践均始于周边。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建设的知识需要、决策制定和安全应对措施等因素共同催生了对区域国别学的需要。深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安全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不仅能够揭示学科发展的实践动力，也能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领域的智力支持。

倡议实践与学科发展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区域国别学在中国兴起的重要背景。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将国别与区域研究列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五大学科方向之一恰巧均在2013年。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性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科建设之间的深层联系。“一带一路”建设实践走过了十多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区域国别学也已经被列为一级学科，在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学科与战略的协同发展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知识生产逻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导学科发展方向，而学科发展又为战略实施提供智力支持。

在安全风险评估与管理方面，区域国别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目前在一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仍存在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状况不稳定的情况。此类域外特别是周边安全问题与我国国家安全有着重大的联系，涉及能源安全、海外利益保护、经贸安全等方方面面。当前，安全问题呈现更加突出的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乌克兰危

机本是传统地缘政治冲突，却造成全球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⑦ 研究区域国别最重要的是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制度、规范，乃至文明基因。^⑧ 区域国别学通过对各国政治稳定性、法律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矛盾等方面深入研究，能够提前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充分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知行合一。^⑨ “一带一路”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需要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来支撑。中国已同周边 17 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同周边 25 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成为 18 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钢铁驼队”联通 11 个亚洲国家的 100 余个城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的正式通车让地区国家圆了“高铁梦”，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巴经济走廊、中马“两国双园”等一大批项目有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⑩ 在这种背景下周边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当前，“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正在持续推进，众多项目在共建国家密集展开，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多重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具有复合性、联动性和动态性特征，需要从理论到实践的创新性应对。“周边安全学”为解析这些挑战提供了系统框架，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特色解决方案。所以，“一带一路”建设、“周边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学同频共振、互为支撑，已形成了“学”与“用”的良性循环。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安全政策给地区形势带来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深化与周

边国家的经贸、投资及发展合作，增强中国市场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⑪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安全与发展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周边安全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为破解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零和博弈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未来中国需进一步深化“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通过理论体系自主化、风险防控智能化、区域治理协同化和话语传播多元化，筑牢“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安全基石。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共同探索的，是一条超越霸权对抗、实现共同安全的新路。这条道路根植于亚洲“亲仁善邻”的文明传统，成长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实践，终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绽放独特光芒。

结语

“周边安全学”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区域安全环境与中国“一带一路”实践需求中逐步形成的系统性理论。这一学科聚焦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利益交织、发展路径依存和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是关系到中国安全稳定最重要的地缘战略地带，与周边的关系如处理科学得当，周边地区就会成为我国安全的战略屏障。中国周边外交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周边安全”“周边外交”“周边国家关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战略考量。探讨周边安全研究的学科化路径，不仅关乎学术发展，更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周边安全学”的理论根基深植于中国传

统文化与当代外交实践。“亲仁善邻”“和合共生”等儒家思想为其提供了文化基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则构成了其发展脉络。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面对沿线国家的复杂安全环境，中国在周边外交中创造性提出“融通型周边外交”理念，^⑫强调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这一理念超越了传统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零和博弈思维，将安全与发展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视阈下，周边安全态势特别是东亚安全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影响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未来。中国周边地区能否出现合作势头，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与稳定，也与世界格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可见，周边安全研究在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研究中占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在当前世界地缘政治冲突形势非常严峻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将所面临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挑战视作为促进同周边国家沟通与拓展合作范围的新机遇，推动周边战略合作再上一个新的高度，使周边新的战略合作成为亚太合作的“领头羊”、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稳定器”、解决地区危机与热点问题的“减压阀”。^⑬共同建设适用新形势的地区合作机制，进而构建周边长期安全稳定的地缘新秩序。所以，加快构建“周边安全学”是中国周边与世界形势发展新态势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注释】

- ①翟崑:《深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载《人民日报》，2025年5月23日，第09版。
- 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25年4月9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504/t20250409_11590690.shtml，访问时间：2025年10月20日。
- ③《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网，2024年07月21日，<https://politics.people.com.cn/n1/2024/0721/c1001-40282040.html>，访问时间：2025年10月20日。
- ④《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外交部网站，2023年2月21日，https://www.mfa.gov.cn/wjbzxw_new/202302/t20230221_11028322.shtml，访问时间：2025年10月20日。
- ⑤《国防大学代表团专家阐述亚洲安全模式三大要素》，载《环球时报》，2025年6月1日，第7版。
- ⑥凌胜利:《“亚洲安全模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载《环球时报》，2025年4月18日，第14版。
- ⑦傅小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载《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2期，第3—24页。
- ⑧赵可金主编:《区域国别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页。
- ⑨赵磊:《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载《人民日报》，2025年1月16日，第03版。
- ⑩《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第03版。
- ⑪周方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化与周边外交策略选择》，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第22—27页。
- ⑫邢广程:《全球视野下中国融通型周边外交的主要内涵与实践路径》，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4期，第7—12页。
- ⑬《王毅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外交部网站，2023年11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311/t20231126_11187325.shtml，访问时间：2025年10月20日。

（截稿：2025年11月 责编：季哲枕）

作者简介 李敦球，曲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